

第五章 高度現代性之下的政治

如前章所述紀登斯指出現代性隨著其全球化及反身性作用，已經遇到了自己的限度，呈現了道德與存在的困境，因此需要同時以哲學的保留主義、生態思想及社會運動來共同建構「後匱乏時代」的秩序。因此政治學並不只是一般意義下的政治學，更是一種所謂的「生活政治學」(life politics)，這種生活政治學必須先回到能動者個人對自我的反思性建構上面出發來進行探討，同樣地，正式政治領域在這種狀況之下的政治治理自然也不同於以往¹⁰。

第一節 高度現代性的治理原則與風險

紀登斯主張面對這樣的事實，我們一方面必須對啓蒙「控制一切」的野心有所保留，另一方面，必須在傳統不再是自明之理，社會世界與物質世界已經無可避免地都是反思性地被組織起來的事實狀態下，在充滿不確定性的事物中做出選擇與反思性的經營，並認識到各種事件與問題可以也一直會受到持續不斷的公開討論。

然而「解放政治學」已如前述，並不足以幫助我們適應這樣的新情勢，因為解放政治學容易引發任何價值都是相對的主張，無法加以判斷的想法，也容易流於只強調個人自由選擇，卻忽略與他人及自然協調共處的重要性。生活政治學則不僅關心個人自己的認同與選擇，也關心社會生活的普遍方面，如生態議題、性別議題等等，不僅是對自然與傳統「消失」的回應，更是對自然與傳統的經營。

¹⁰ 紀登斯在 2002.04.15 來台所做的演講中提出全球化、知識經濟、個人主義等三大轉變，是歐洲中間偏左政權必須調整路線的原因，與筆者前兩章的分析是類似的。

當然它也涉及到正統的政治事務，例如關於「工作」與「進步」等屬於正統政治學範圍的主題，生活政治學也對其涵意提出了深刻的反省。當然正統政治學也必須對生活政治學所提出的議題妥為因應，才能獲得其成立的正當性。換另一個角度來看，生活政治學不僅牽涉到個別主體在哲學層次如何看待自己存在的意義，以及在互動層次如何與他人互動，還必然牽涉到結構層面的問題。因為在這樣一個全球化、去傳統化、反思性不斷增加的世界中，完成人的自主、連結與幸福，是政治治理的目標，這並不能只靠權力的鬥爭，更需要個人、企業（市場）、非政府組織、國家（政府）與全球的合作來加以完成（Giddens, 1991: 214-217; 1994b: 14-15）。

從這樣的立場出發，紀登斯認為作為不放棄進步可能性的激進中間政治路線，我們應該懷抱有基於世界主義與烏托邦現實主義的責任倫理學，結合哲學保守主義、生態思想及古典的社會主義思想的精華來重構激進中間政治。

其中世界主義不是懸置一切價值判斷，或認為一切價值都只是相對的，而是認為現代性發展至今讓人類第一次真正有機會討論普世價值，如生命的神聖性、普世人權、物種的保留、關心當代及未來的兒童等等。世界主義者的激進政治學，就是要以這些普世價值來作為行動的指導原則，但這些價值都可以透過守勢來達成，這也意味著個人與集體的責任倫理學可以超越利益的歧異，它不是要強加給個人種種的責任，而是希望透過個人基於相信某些理由，自由地做出承諾、獻身經營與投入，並以此作為激進政治的能動力。這種責任倫理學既拒絕消極性的天命論，也不認為人類創造出來的問題自己也能加以解決，或認為有特定的責任承擔者可以完成「歷史目的」，而是願意承認風險，並採取沒有外在保證的批判主義，認為只要人類願意努力，則狀況可以變好，但如果不付出努力，則狀況將變得更糟（Giddens, 1994: 20-21, 246-253）。

而所謂的「激進」中間，除了不放棄進步的可能性之外，也要對根本價值觀

進行重塑，擺脫過去左派或右派的價值分類，不再認為必須遵照過去分類的某一類價值觀，反對另一類價值觀。而是依照現代性的需求，對各種價值進行檢驗，放棄不合時宜者，而採納符合需求者，並加以堅定地實施。紀登斯認為因為現代性的問題都需要積極採取行動加以解決，因此「中間左派」並不一定是「溫和的左派」，幾乎所有的生活政治問題，都需要在不同的政府層面上採取激進（積極）的思考、政策，才有可能解決，並使得由全球化所帶來的機會最大化。

在《超越左與右》一書中，紀登斯提出六項政治框架，分別是：修復被破壞的人與人之間的連帶（團結）、承認生活政治的中心地位不斷增加、提倡創生性政治（generative politics）理念、更徹底的民主化、從根本上反思福利國家，及解決暴力問題，來作為激進中間政治的框架（1994b: 11-19）。並提出十項關於發展的新的意涵，取代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生產主義式發展概念，其特性有：一、必須有反思性的參與；二、必須將損害的限度視為核心考量之一；三、必須將生活政治視為核心；四、必須將自立與正直作為發展的內涵、五、必須區分已開發國家因為浪費與窮國為了生存而造成的環境災難；六、必須將提升婦女的地位視為發展的組成成分之一；七、必須強調自我保健的重要性；八、必須在對抗家父長制與剝削兒童的同時，努力維持家庭的連結；九、強調權利也強調責任，此責任又與自立密切相關；十、從國家、商業組織、本土等角度共同充實發展的內容，並重視其創生性本質，注意本土的需求與利益（1994b:159-162）。

在《第三條路》一書中，紀登斯結合美國新民主黨、斯堪地那維亞積極勞動力市場計畫，並反思了新自由主義對既存機構及菁英的攻擊，為社會民主政黨提出其價值觀：平等、對弱者的保護、作為自律的自由、無責任即無權利、無民主則無權威、普世的多元主義以及哲學的保守主義。以及第三條路政治思想的行動綱領：激進的中間派、新型民主國家、積極的市民社會、民主的家庭、新型的混合經濟、包容性的平等、積極的福利政策、社會投資的國家、世界性的國家以及世界性的民主（鄭武國譯，1999）。另外，根據紀登斯 2002 年在台灣的演講，第

三條路的五個核心內容分別是政府改革、公民社會改革、經濟改革、社會福利改革、公共服務改革（紀登斯，2002）。

這些較細目式的框架、意涵、價值與行動綱領都是因應現代性社會急遽變遷所面臨的風險，嘗試在左與右、傳統與現代、社會與個人、男性與女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社會福利與自由市場等對立之外提出重建社會信任的嘗試（劉維公，1999）。紀登斯（1994: 97-100）配合他所提出的現代性四大維度，指出我們面臨了經濟兩極分化、生態破壞、大規模戰爭、否定民主權利等結構上四大具有嚴重後果的可能風險。其中經濟層面的風險是關於大規模貧困的問題，其解決並無法靠更多的發展，甚至「發展」概念本身即是造成貧困的原因；生態破壞不僅涉及非永續資源，更牽涉到垃圾處理、溫室效應、臭氧層破洞、雨林破壞、沙漠化、水的毒化等等問題；大規模破壞性武器的威脅雖然隨著冷戰的結束而減少了，但其威脅仍在，且暴力還存在於更世俗的環境中；民主權利的問題出現在許多人的處境已經艱難到完全無法開發自己的任何一小部分潛能。

在這四項風險的應對方面，首先，我們必須注意到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後匱乏時代，雖然短缺的問題還在，但並無法透過經濟成長而解決問題，甚至過度強調積累的概念將威脅與毀滅真正有價值的生活方式，因此必須積極限制及反對不顧一切追求經濟收益最大化的主張。其次，我們已經被迫必須在人為化的狀況之下探討生態問題，而且不再只是擔心自然會對人類做了什麼，更必須擔心人類對自然做了什麼。一種評估人類影響生態程度的方式是探討人類使自然偏離再生的程度有多大，並依此進行補救。此外，還必須依照對未來的設想來重新解釋過去。在暴力問題方面，一方面必須注意到工業發展使得戰爭能夠產生大規模毀滅的效應，另一方面必須注意到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使用物質力量來達成目的的作法也可能是一種暴力的問題，並且尋求以對話交流加以取代；民主權利方面，減少暴力一方面要進行權力的協商，另一方面則是發展多層次、更深入的民主（Giddens, 1994: 97-100）。

紀登斯把現代性境況、風險、轉化機制及機會，配合制度性向度分別做成不同的示意圖，茲整理成表 5-1 如下：

表 5-1 現代性的制度性向度及其可能發展

制度性向度	資本主義	工業主義	軍事力量	監控
現代性的全球化	世界資本主義經濟	國際勞動分工	世界軍事秩序	世界「民族——國家」體系
後果嚴重的風險	經濟崩潰、貧富日益懸殊、生命商品化	生態惡化	核子大戰爆發、戰爭工業化	集權主義增長
社會運動	勞工運動	生態運動	和平運動	民主運動
後現代輪廓	後匱乏系統、社會共有化的經濟組織	技術的人性化、關心生態系統	廢除軍事控制、控制暴力的使用	多層次的民主參與、協調化的全球秩序

第二節 多層次民主與民主的深化

上述紀登斯關於高度現代性風險的應對措施需要進一步的闡釋，以下先針對民主的概念進行論述。

一、對話民主（dialogic democracy）

紀登斯（1994b: 104-110）指出在民主化的來源中，有許多是與自主與受人尊重有關，亦即與個人能動者有關，也就是說結構或制度面向問題的解決仍以個

人能動性為基礎。然而自由主義代議式民主發展至今，許多影響人們生活的重要變化已經不是由正統的政治領域所產生，也無法完全透過正統政治領域來加以解決。從正面來看，這使得人們從傳統政治的領域中解放出來，政治變成只是人們的眾多參照點之一而已，但這種看法也不得不承認這種政治方式有其負面的效應，例如決策遠離選民，而且受到政黨利益所左右，導致了大規模的疏離與冷漠，選民的好惡似乎也變得反覆無常等等。

紀登斯（1994b: 113-116）認為這樣的問題必須引進對話民主來加以解決，對話民主是指人們能夠有充分發展的自主溝通，透過這些自主溝通形成有效的對話，據以決定政策與活動。對話民主試圖透過對話過程中所產生的社會反思性來傳遞民主，它不一定要達成共識，而是要求在公共領域中人們以對話作為相互容忍的相處之道。紀登斯指出他所主張的對話民主與米勒（D. Miller）的慎思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有關，慎思式民主承認政治選擇會出現衝突，而民主制度的目的就是要解決這樣的衝突，並透過開放和非強迫的討論取得一致的判斷。它也承認許多問題沒有單一的正確答案，結論也往往會有爭議，但它認為可以透過一些規準來達成共識或使結論正當化，並且可以透過增進執政者與代議員行事的透明度來確保慎思的過程得到確實執行，而且當人們對於政策及所據以達成共識的規準有所不滿時，還可以透過正式的選舉程序來加以取消。但紀登斯認為我們並不能滿足於正式政治領域中的慎思式民主，還應該考慮如何在日常生活與全球化交織的更廣範圍中實現真實及潛在民主化。

紀登斯（1994b: 117-120）認為對話民主在非正式政治的四個相互關聯領域中取得了進步，並進一步影響了正統的政治學領域，其中含有機會，也包括問題。第一個領域是個人生活領域中所發展出來的純粹關係，這是個人透過知識與情感的交流，將自己開放出來所建立的關係。其中包含兩項要點，首先，要能向他人開放自己，需要個體能夠了解自己，要瞭解自己又需要將自我的反思與自己的情感連結在一起，從了解自己到接納自己，進而才能與他人形成有效的關係。其次，

對話也是純粹關係的必要條件，透過對彼此相互涉入的範圍、程度以及相互間義務應該包含那些內容進行開放性的討論，才能維持彼此的關係。也就是說兩個彼此平等看待的個人之間，對話是最重要的互動性質，它不僅是調解爭端的手段，更是建立相互容忍的手段，也將有助於形成正統政治領域中的民主框架。

對話民主得到發展的第二個領域是社會運動與自助團體的增加。這看似不相關的兩項發展所具有的內在聯繫主要來自於它們為公眾對話打開了空間，不論是創造更大的論述空間、關心自主權的發展、增加自我了解或是促進與他人的交流，都是如此。尤其在面對專家系統時，受到影響的人們通常都不再消極地觀望，而是會積極地組織起來，透過與專家的積極對話來恢復自主權（Giddens, 1994b: 120-121）。

對話民主發展的第三種情況是發生在具有正式組織場合中的後科層體制。雖然科層體制並未消失，但後科層體制式的組織將更能因應社會反思性與人為不確定性。因為這種按照積極信任所構成的組織必然會發展出責任的概念，並且依靠一個擴大的對話空間來建構。當然這種以責任為基礎的組織必然承認地方性知識的必要性，而不會將其斥為不具普遍性的知識（Giddens, 1994b: 121-123）。

對話民主獲得進展的第四個領域是全球性的非正式組織聯盟，此與較大範圍的全球秩序有關，許多非正式組織已經繞過民族國家而建立了全球性聯繫，這些非正式政治領域的機制包含各種社會運動與自助團體，當這些機制普遍之後，就更能促進民主制度的民主化。此外，越來越普遍深入人心的世界主義使得各種不同文化與不同傳統間的接觸點不斷開展、擴大，讓各種文化與傳統產生前所未有的常態性聯繫，也拓展了潛在的對話空間（Giddens, 1994b: 123-124）。

二、民主與連帶（團結）：從人際關係到全球秩序

紀登斯（1994b: 124-125）指出雖然上述對話民主在現今仍然是可能性多於

現實性，但這樣的潛在可能性卻使我們看到民主與新的連帶概念之間的關係。因為隨著去傳統化以及社會反思性的增加，人們已經不再有特定既予的定位，而是必須不斷地進行選擇，並透過這些選擇來定義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也就是說人們必須建立自己的傳記以保持個性的連貫意義。但要維持這種傳記，並非只靠自己即能完成，而是必須透過與他人產生互動，如果不與人互動，自我傳記的意義即無法維持。這種事實創造了新連帶概念的可能性，其中的關鍵因素即是積極的信任。

紀登斯（1994b: 125-127）主張只有在承認自主、民主化與社會反思性的狀況下，社會連帶才能有效更新，這樣的更新必須承認義務，而不僅僅是權利，義務不僅與他人的需要相聯繫，也涉及到與他人長時間的聯繫。這其中牽涉到兩項因素，首先是對差異的積極態度，過去基於「相同」而主張社會連帶的理由已經失去其正當性，在後傳統的時代，人際關係的維持需要對差異的積極對待，並敢於將差異視為發展積極情感溝通的手段，既開放自己，讓自己能夠對他人所貢獻、取得他人的信任，同時也要設法了解他人，逐漸信賴他人，從這種關係中得到回報。其次，是要將這樣的互惠的關係作為人際互動的義務。這種義務具有一定權威性，因為唯有雙方都能真誠相待，社會連帶才能維持下去，才能維持長期的聯繫。任何一方的不真誠即會破壞彼此連結的基礎，因此這種義務的反面不是權利，而是不負責任、出賣了他人的真誠。

但是這種立基於真誠與溝通所建立起來的人際關係，仍不足以解決更廣大範圍的社會問題，紀登斯（1994b: 127-132）主張抽象系統中的積極信任還需要依靠社會可見度與透過協商得到的責任；國家必須有公民結社的概念；世界秩序則需要有基於世界主義的溝通與全球治理，茲分述如下：

在由象徵性符號與專家系統所組成的抽象體系領域中，對話民主集中在「次政治」，亦即對單一議題給予關注的生活政治，其中頗為顯著的議題是科學與技

術創新對社會生活的衝擊。過去科學家往往宣稱其研究只單純地驗證理論，對後果不負責任、不受道德束縛，主張唯有如此才能獲得真理。但紀登斯認為在這樣一個人們已經無法擺脫科學與專家系統影響的社會中，科學不可能再與責任和道德相隔離，而且科學如果要認真處理關於真理與責任的問題，就需要開放，與個人一樣以開放來獲得信任（1994b: 127-128）。這很顯然地是要回應李歐塔對科學的批評（陳幼慧，2002）。相對地，我們對科技的積極信任並非意味著我們要毫無保留地接受或依賴專家系統，而是要進行反思性的經營，亦即要雙方都具有透明性與責任，即使這種反思性的經營會令有些人相當困惑，也讓有些專家相當厭惡，但唯有如此，才能促使雙方都面對責任，不再逃避。換個角度來看，在日常生活已經變成實驗的狀況之下，人們要發展自主與維護連帶，就只能透過對話的方式來達成，不僅人與人之間應該如此，政府與各個機構在過濾與管制專家知識時，也必須透過同樣的方式來進行。

適用於專家與常人之間的對話民主，也適用於公民秩序與全球秩序的廣泛層面。關於公民秩序，紀登斯（1994b: 120-121）引用維柯（G. Vico, 1668-1744）、歐克夏（M. Oakshott, 1901-1990）與杜威（J. Dewey, 1859-1952）等人的看法，指出公民狀態與公民結社都是一種「人的關係」，一種必須經過學習及了解才能享有的正常人之間的關係，亦即以一種尊重他人自主權的方式與他人生活在一起，相互連結與承認彼此都同屬公民。民主制度的公民效率即是一種以社會慷慨的態度在「取」與「予」的經驗中彼此分享的能力。但紀登斯對「共同體」（community）作為連帶的核心觀念有所保留，而主張應以「結社」（association）的概念補充之，因為共同體往往是依據某種既定而有一定強制力的規準，如血緣、宗教、地域、種族、階級等等來區分人們，讓人們無從選擇，而且這樣的分類通常都具有強烈的排外性，結社則是透過個人主動選擇所產生的。

另一方面，公民結社並不只是向他人開放自己而已，它同樣必須要對差異進行積極的評價，並且以一種世界主義的態度接觸各種團體、觀念與背景脈絡。世

界主義者並不認為所有的價值都具有相同的地位，而是強調個人及團體對他們所堅持的思想與所從事的實踐具有責任，能夠清楚表達自己所獻身投入的理想，並判斷這些價值對其他具有不同觀念的人所具有的意義。當然相對地，世界主義者也應該能夠判斷不同觀念的他者所持有的價值對自己有何意義。世界主義因此既依賴又促進對話民主，並且是將個人自主和人際間的連帶兩項概念連結起來的最好媒介。

紀登斯（1994b: 130-132）總結地認為民主的壓力是受到全球化、去傳統化及制度化反思的影響與推動，這三種因素共同創造了必須以某種方式填滿的「空間」，這個空間可以用對話並產生積極信任的機制來加以經營，但也可能被基本教義派、強迫性行爲、耽溺所填滿。民主化的兩個方面之一是個人生活及人際關係的民主化，它的影響會滲入更正式及公共的社會環境，但這種人際關係所產生的連帶並不能直接放入更大範圍的制度中，因為這裡的信任機制主要是依靠人際間彼此的真誠，無法擴大到不在場的他人或群體。民主化的第二個方面是更大範圍的制度面，其中的民主還必須強調責任與可見性。另外，透過公民結社所推動的民主化國家觀念，以及透過世界主義推動民主化國家彼此之間的互動，以及民主國家與其他組織之間更全球化的互動，都將共同推進民主的深化。

三、民主、不平等與權力

紀登斯（1994b: 132）認為民主反對強制性的權力，並試圖將其轉化爲一種協商關係，不論牽涉其中的雙方具有平等或不平等的權威，他也主張民主雖不依賴物質平等，但物質資源不能被用來阻礙觀點的表達與扭曲對話。相對地，由於文明秩序、政治制度與經濟領域是具有相互關連的制度框架，只藉由物質的重分配來消除貧困的解放政治學必須搭配如何生活的生活政治學，否則並沒有太大意義。要了解這種主張必須先檢視福利國家的困境，並探討其出路，這一點也與資本主義面向有所關連。

第三節 福利國家制度的困境與出路

西方福利制度的存廢與規模的大小是不同政治理念的支持者爭辯的焦點所在，其歷史來源、面臨困境、出路、改革與目的，都必須有所辨明：

一、福利國家制度的來源與困境

紀登斯（1994b: 136-138）分析指出福利國家制度的結構性來源有三：一是勞動在社會中已經具有關鍵性的核心地位，二是國家爲了維持穩定與連帶而刻意加以促進，三是嘗試對風險進行管理。也就是說福利國家有保障充分就業、財富重分配、風險管理等功能，過去大多數人都從前二者來探討福利制度，但現在第三者才是解決福利國家制度困境的出路，因爲這些促成福利國家制度的結構性因素已經發生改變。

首先，在勞動觀念的改變方面，過去在生產主義主導之下，工作具有明確的核心價值，其作爲一種付酬的雇傭勞動，與生活的其他領域相分離，不僅有它自己內在動力，甚至成爲人是否有意義與價值的標準，因此可說生產主義式的工作概念具有自主性，甚至是強迫性。但是這種生產主義卻產生了一項嚴重的後果，即是把大部分的道德經驗的形式排擠到社會生活邊緣。與此相關的現象是，因爲男性的角色、價值與地位主要以付酬式勞動來界定，因此，男性幾乎將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這些項目之上，至於情感、照顧等任務就交由婦女來承擔，女性成爲社會生活中道德結構的保持者，成爲「愛的專家」，男性則與愛的事物絕緣，形成男性負責公領域，女性負責私領域的現象。然而事實上「愛的專家」角色雖看似與工作無關而不具重要性，但事實上「愛的勞動」卻是支持工作的基礎，與工作本身同樣重要，沒有情感性的支持，男性在工作上的表現將難以維持。加上在後匱乏社會中生產主義開始消解，並且受到積極的反對，首先是工作所具有的強迫性不再被視爲理所當然，人們要求對工作的動機進行公開的檢視，越來越多人已

經了解到過一種幸福的、令人滿意的生活是一回事，創造財富是另一回事；其次，婦女的大量就業也打破了作為工作基礎的男女角色區別；再者，女性要求在公領域的平等地位，要求有公領域的自我，拒絕只從事情感性工作等，都使得男性必須面對他們自己的「隱藏自我」——自我的情感面（Giddens, 1994b: 176-177）。

其次，全球化使得公民不再將自己的財富等同於國家的財富，國家不僅無法有效控制其內部的經濟生活，主權的觀念也受到全球化與社會反思性的破壞。加上階級觀念已經發生改變，不僅代與代之間階級的傳遞性降低，個人也可能在一生中經歷不同階級地位，階級變成主要是由各式各樣原因所導致的差異性機會與限制，社會差異變成主要透過個人如何主動安排的結果。也就是說紀登斯認為當今社會許多人普遍主張個人生活得如何，主要是決定於個人如何利用其所能掌握的機會來安排其生活，與其擁有的財富相關性不大。這種事實使得同一國家內各階級間應該互助扶持的主張失去說服力，福利制度的階級妥協特性因而不復穩固。再者，過去的福利制度已經產生了福利依賴的負面效應，許多使用社會福利的人並不一定是真正需要它的人，而是以一種工具性的態度來使用它，造成國家的沉重負擔，而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們卻仍無法得到有效的幫助。此外，那些長期沒有正式就業或長期失業者聚集的區域中，人們會有被排除的社會孤立感，而且因為長期只能依賴，又無法參與到更廣大的社會中，使得結構性的問題轉為文化性的問題，導致深層的文化士氣低落，自暴自棄。其結果是對可能的機會無法把握，進一步地這些人會躲避與其他較富裕的團體接觸，形成文化排斥。因此，過去的福利國家制度乃有需要積極加以改正（Giddens, 1994b: 140-148）。

第三，在風險管理方面，前現代時期人們基本上存在的是幸與不幸的觀念，並認為這些都是命定的、自然的，無可計較。進入簡單現代性之後，人們開始相信風險可能降臨在每一個人身上，但認為這些風險屬於無法完全控制，只可以被認識、預期與管理的外部風險。進入反身現代性之後，風險的「人為性」意識開始出現，加上人們發現有些全球性風險是不能被補償的，因為它們的長期後果是

巨大、未知、無法準確地加以估計的，並可能深入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中。因此，風險的考量不再只交由專家依據過去經驗計算而制訂保險，而是每個牽涉其中的人都應該有參與決定的機會。此外，由於每個個體的生活目標不同，對幸福的要求亦不同，但其個人作為卻會影響到其他個人，必須有所規範，這些都不是舊式的福利制度所能有效因應的（Giddens, 1994b: 151-153）。

二、福利國家制度的出路

（一）關於工作——超越生產主義邁向生產力

紀登斯（Giddens, 1994b: 175-176）認為非正式部門與後匱乏秩序的出現對前述生產主義的「工作」概念產生了轉化的作用。儘管工作的「自主性」仍然存在，並仍定義著何謂「失業」，但與舊式福利國家密切相關的充分就業概念已經不再具有太大的意義，問題已經轉移至「在哪一種情況下就業？」以及「工作與其他價值之間具有何種連結？」等等，人們重新面對的道德問題，無法逃避。

紀登斯（Giddens, 1994b: 177-180）主張如果能夠將生產主義轉向生產力，以生產力取代生產主義，則現代社會中工作時間減少與家庭的形式發生轉變這兩項變化將具有解放性效果。生產力強調的是時間投資所獲得的相對回報，它不僅與系統的自主與靈活程度密切相關，而且不能僅限於單純的經濟意義上，也就是說生產力強調社會指標應比經濟指標具有更根本的重要性，時間的價值不能只從商品化的角度來計算，而是必須從合作的工作與「生產者——供應者」間建立合作伙伴關係出發，恢復被生產主義所破壞的倫理關懷。與生產主義的強制性與依賴性相反，生產力良好的生活即是個人能夠作為獨立的存在與他人交往，並且擁有完整尊嚴的生活。

過去的生产主義式的福利政治因為純粹由經濟的角度看待工作，因此設定了退休的制度，期能達到「充分」就業的效果。但在高度現在性之下，年齡不再是

具有工作能力與否的決定性因素，退休也不再是過去僵化的概念，老年的生活方式不再只有一種，老年人也能不斷地進行積極的社會生活實驗，並對社會做出貢獻。因此，退休年齡不應該有強制的限定，應該視個人的身心狀態而定，工作對老人而言，重點不再是帶來金錢上的收入，而是帶來滿足，其滿足與否又來自於生活的其他方面對工作價值的評價，也就是說退休的人也可以重新出發，創造工作的第二春，因此工作與退休的概念都發生了變化（Giddens, 1994b: 185）。

超越生產主義在某種程度上還可能意味著保護地方傳統或連帶，即使這可能與提高物質生活水準的目標相衝突。因為事實已經證明，任何不尊重地方連結及生活方式的福利計畫都具有破壞性，其所具有的破壞力，與獨尊市場的破壞力同樣重大。這種福利政策雖然號稱是立基在理性基礎上進行設計，卻不顧地方特色，必將產生自我破壞的效果，因為它忽略了無數的日常忠誠、人際連帶，而後面這些因素卻是拯救個人使其免於被社會整體壓碎所必須，雖然這些日常忠誠、人際連帶所形成的傳統與慣例可能根源模糊，但卻也可以是多種創造性的活動（Giddens, 1994: 184）。

（二）關於社會劃分——不同身份間的協調

紀登斯（1994b: 169,188-190）認為雖然勞工運動在今天的社會中已經大幅減少，階級因素在集體行動中所發揮的影響也已經部分地被排除在現實之外，但在其他社會方面的劃分及所產生的緊張關係仍然持續存在。這些緊張關係主要反映在社會菱形結構的四個方面，即世代、家庭、工作與性別之間。例如老年人與年輕人之間的衝突，老年人的需求透過動員在選舉上可以產生重大的壓力；家長與兒童的衝突主要來自社會及科技的改變，使得兒童的經驗明顯不同於父母親，而擁有越來越多權利的兒童也會因為父母親不充分的照顧而心懷憤怒。這種兒童權利增加的現象是件好事，也為潛在的民主與情感的民主提供助益，但兒童離開父母的權利除了提供了新的連結之外，同時也破壞了一些舊的連結，並產生一些潛

在的破壞，例如由社福機構照顧的兒童越來越多，無家可歸的兒童及青少年也不斷增加。在工作方面，許多青年人刻意避開勞動市場，而追求其它的可能性，這雖然可能是一種開風氣之先的社會先鋒，但卻有更多的年輕人是非自願地被排除在就業市場之外，失業者是否會形成與在職者之間的衝突，也有待觀察。在性別的衝突方面，由於婦女的自主權與平等權的彰顯，使得過去婦女被強迫擔任無給職照顧他人的角色已發生改變。另外在生活中，究竟是強調勇往直前的男性氣概與市場機制會越來越普遍，或是強調相互依賴、情感的了解及照顧的女性氣質會越來越滲入公領域中，也仍是尚未有答案的問題。但紀登斯認為可以從兩性關係方面著手，來解決這些問題，如果兩性之間能夠達成一定的協調，則可以成為其他方面恢復連帶的關鍵，因為性別劃分的改變會導致工作劃分的改變，同樣地，家庭生活的改變也將在代與代之間的分離或連結上產生關鍵影響。

至於在貧富之間，紀登斯（Giddens, 1994b: 190-197）主張讓所有的人都瞭解現代主義、生產主義的發展概念所帶來的缺陷上，而在其處置上雙方都有責任，亦即不僅要幫助窮人，也要幫助富人，要讓富人與窮人達成協議，並進行所謂的「努力面向的協商」，亦即將自己的精力與時間投入一些事物中，而將另外的事物交由他人。其中富人應能使窮人免於絕望與強制，窮人應擺脫依賴。為何富人與窮人必須達成協議？首先，富人可以幫助窮人擺脫物質上的缺乏，而窮人則展示了付酬性工作並非生活的核心，依賴自己（自立）、真誠、保護環境與社會責任，都是具有回報性的生活方式。其次，因為任何希望生活得更健康的人都與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出現問題的人具有共同利益，此共同利益有擺脫生產主義、邁向生產力，不再是像以前那樣地給予經濟成功毫不保留的評價，而是更重視愛與情感交流，以及避免造成環境的惡化及隨之而來的災難。因此，執掌國家機器的政府應與各種團體，特別是各種國內外自助團體，共同協助人們發展出自主而不依賴福利制度的生活。

三、福利制度的改革

（一）積極性的福利

對福利制度的主要批評除了有無法真正落實平等、缺乏鼓勵進取的精神、沒有真正幫助到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最弱勢者之外，還有富者並沒有得到益處。因此，紀登斯（Giddens, 1994b: 180-181）主張理想的福利政策應該是積極性的福利，應該成為社會流動及個人成就的跳板，盡可能給予人們教育與工作、能力與責任，而不是直接給予財貨，並鼓勵人們積極承擔風險，同時也能獲得保護。也就是說紀登斯主張積極的福利政策應該確保每個人都擁有相同的自由去實現自己的幸福。而且就面對風險與承擔責任而言，受過更多教育的人們將更有能力在這個更激烈變化、更反身性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二）平等與幸福的意涵

紀登斯（1994b: 191）主張後匱乏社會對平等的理解不應仍只從財富分配的角度來進行，而應該從兩個相互有所聯繫的概念——相互合作以克服集體性缺陷，以及全面擺脫生產主義——出發。亦即人們必須對經濟成長的限度有所了解也不只以經濟成長為目標，但這種主張也不會淪為主張共產主義式的無限分享物質，而是將物質視為在追求幸福的目標中非關緊要。

在幸福方面，紀登斯（1994b: 180-182, 191）認為幸福是一種需要加以詮釋、積極培養與追求的狀況，並透過安全、自尊、自我實現，以及愛的能力來推動。它可以普遍化，不會威脅他人，也不是社會連帶的對抗物，它是一種需要透過控制自己內心的感受來控制生活品質的狀態。這並不否定物質條件的重要性，也不默認既有的不平等與剝奪，而是主張幸或不幸與財富及權力沒有特殊的關係，也就是說構成幸福的安全感、自尊與自我實現，並不會因為擁有財富而獲得，有財富與權力者未必快樂，富者損失一些金錢也無礙於其幸福。相對的，窮人不因其缺乏財富而必定不快樂，也不應該被剝奪擁有快樂的機會，只是因為過度的貧窮

會使人失去希望或遭受強制，必須獲得積極的解決。一些研究顯示只要能夠相對地改善其處境，甚至是那些生活在最底層的人們，也有許多人能夠因此而生活得滿意與充實。至於財富與幸福的關係主要決定於生產這些財富的過程，不勞而獲或勞而不獲都不能導致幸福。

此外，一些存在性的問題，如意外、疾病、死亡也會完全切斷財富與幸福的意義，這些存在性問題應該被積極地加以面對，而不能單單只是被動地接受。也就是說，幸福來自於積極地參與生活，以及利用自己的能力，在克服內部或外部困難的過程中獲得快樂，而非被動地滿足於無目的的生活及不對稱的財富。

因此，在政治治理方面，紀登斯（2000: 86-88）主張現代的社會民主主義必須發展動態的、能提供生活機會、著重機會平等的政策。這種政策雖然相信自由與平等之間的衝突必然存在，但也相信可以發展出一種在平等與多元主義、多元生活方式之間的平衡。也就是說社會民主主義機會平等的政策一方面要為人們提供動機，另一方面承認機會平等可能造成更大的收入不平等與文化分歧。他從倫理自由主義（ethical liberalism）及更晚進的一些學者的主張中進行探討，發現平等與自由的協調可以從「社會能力」觀念作為起點，亦即平等不應只是針對可用的社會及物質財貨方面分配的平等，更應該是指有效率地應用這些財貨的能力。因此，政治上的設計應該著眼於促進個人整體能力的發揮，該能力是指追求個人幸福的整體自由，亦即要讓每一個人都能有充分的能力依自己所能獲得的資源，追求自己的福利與幸福。不利則應被定義為能力不足，不只是失去財貨，也是失去透過財貨達成幸福的自由。

紀登斯（2000: 88）進一步指出個人的自由必須透過其作為群體、社群，與文化的成員來展現。因此，多元不能只是個人選擇的多元，也必須是文化與團體的多元，亦即多元文化與多元團體是真正多元選擇的基礎。現代的人們越來越關心要能與他人處於平等的地位，不願意處於低下地位或受權威操縱，甚至許多過

去曾經被污名化的團體如同性戀、殘障人士、單親家庭、愛滋病患者團體也都要受到平等的對待，這種要求也逐漸被社會大眾接受。因此平等的重點在於自我實現的相關議題，關鍵並非經濟剝奪，而是經濟剝奪對個人幸福所產生的後果。

紀登斯（2000: 96-97）認為雖然平等的重點在於機會平等，但是機會平等仍會受到所得平等的影響，因此所得的重分配仍有其必要。「取於富人，施於窮人」是可取且應該的，但其作法應該是容許富者付出少許而保留大多數財產，在不增加對富者更多的控制之下來給予窮人協助。舊左派或理想的共產主義所曾經長期尋求的不惜一切代價的平等主義，是不可能有的前途的不健康想法。紀登斯這樣的主張似乎有妥協的味道，但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要避免讓富人產生自外於社會的自我排除的想法，而且紀登斯相信對於頂端的富有者更多的控制未必能為窮人帶來更多的幫助，真正好的幫助貧窮者的作法應該是透過擴大稅基、低的累進稅率、設法促進供給面的投資以創造更多利潤及可支配所得，在經濟上讓整個社會普遍富裕起來。這種作法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想法是相抵觸的，但紀登斯除了是抱持「把餅做大」的態度之外，也認為在絕對貧窮線之上的所有的人都應該努力追求物質之外的幸福，打好手上的這局牌，而不是自怨自艾地羨慕其他人所拿到的好牌。此外，紀登斯（2000: 120-121）還主張應該避免政府的浪費，並思用最恰當的制度幫助窮人及情況不佳的人，也應該透過國際合作對跨國公司進行課稅，以達到公平與全球治理的理想。

（三）政府應有的作為：創生性政治（**generative politics**）

紀登斯（1994b: 153）認為舊的福利觀念與措施總是在解決已經發生的事，而不是切斷問題的根源。在進入一個更積極、更具反身性風險以及人為不確定性的環境中時，需要的應對措施是預防性、不斷發展的，也需要打破由上層決定的慣例，還需要對專家體系進行反思性的參與。福利措施在這層意義上應該被視為是社會或集體的保險制度，應該探究的是如何在風險與保險之間達成平衡，而不

是討論誰付費、誰獲利或者誰損失了，或是在貧者與富者之間的一種重分配。

紀登斯（1994b: 93-94）指出過去的福利國家制度的失敗並不是因為成本不斷增加或國家對問題無能為力，而是因為環境脈絡的改變。反思現代性已經將個人帶至完全不同於生產主義或消費主義思考的「決策方陣」中，並在現代社會制度核心中創造出一系列具有內部相關的張力，使得生活政治學的問題日益凸顯，因此需要打破過去的思考窠臼，制訂創生性的政治方案來加以解決。創生性具有幾項特性：（1）增進各種有助於實現預期結果的條件，但不由上層決定哪些是預期的後果；（2）在政府機構與相關機構中，創造並保持積極信任的環境；（3）給予受到各種政策影響的人們自主權；（4）創造提高自主權的資源，包括物質財富，亦即創造可以促進廣義生產力的資源；（5）政治的去中心化，促進由下而上的訊息流動及對自主權的承認，但去中心化與中心化並非零和遊戲，去中心化可能因為交換或提供正當性，而增加了中心的權威。

綜合紀登斯所提出來的特點，創生性政治的原則是創造出各種能夠維持積極信任關係，以及有利於人們完成自己所選定目標的條件與資源，但充分尊重人們的自主權。紀登斯（1994: 93-94, 153-157）指出創生性方案不僅需要專家系統，而且需要在個人及全球的層次上對這些專家系統框架進行反思性參與。例如癌症的預防不僅是國家或專家的事，個人也必須在生活方式上採取適當的措施；交通事故的頻繁雖然已經不再令人吃驚，但仍可以制定創生性的政策來減少死傷事件的發生。至於在婚姻及家庭上，創生性政治取向承認積極信任具有核心地位，並重視創造及維持這些信任的條件，即使在雙方分手時，創生性政治也仍將試圖透過教育、管制及物質方面的手段來解決問題，維持這樣的信任。例如針對造成許多婚姻破裂的暴力問題，可以透過三級預防措施，初級是嘗試改變人們的態度與社會的規範，如譴責將暴力視為英雄或勇猛的作法；次級預防可以制定治療方案，針對曾經受到暴力及容易訴諸暴力的兒童及學生來實施；第三級則是針對有病理症狀者進行處遇，並且著重個體在接受處遇之後能夠改變其生活習慣。這些

積極福利不一定需要耗費更多資源，但通常仍要求國家機器的介入，且不限於國家範圍之內，還需要透過國際間，甚至全球性的合作。

創生性政治(1994b: 185)還應該是一種能夠讓人們擁有第二次機會的政治，讓人們不再以宿命論的方式生活，而是有機會培養無數的日常忠誠。這種政治與生活政治一樣不僅關心物質供應，更關注個人的體驗與自我認同。即使就福利制度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失業——而言，也一樣必須以個人有主觀想要得到適當工作的願望為前提。過去生產主義將付酬的工作視為生活的核心，因此福利政策必須以擴大勞動力市場來提供充分就業，或負擔那些離開工作的人。抱持此種生產主義想法的人所思考的「第二次機會」通常都是使失業者找到工作。但在重視生產力更甚於生產主義的社會中，工作的滿足不在於其本身，而是根據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來評價工作的價值，因此第二次機會政治學更關注失業與個人體驗的其他方面和生活價值之間的聯繫，其中非自願性失業的問題在於它不僅導致經濟上的剝奪，同時也造成個人安全感與自尊心的傷害。然而就像是否失業的定義決定於個人的主觀態度，對失業的反應也是一樣，要從個人的自我認同論述及所採取的行動來加以看待。亦即不論是否失業，對自我認同的經營都是一個人對自己是否正在失去能力或者獲得自我增長與自我更新機會的關鍵。

也就是說，第二次機會政治學雖然不否認物質條件是個人據以談判的籌碼，但至少它也同樣重視如何修復個人受損的自我認同，以及發展良好的自尊。這又牽涉到個人在面對不良的物質條件時是否有能力改變心理狀態，以及政府是否有能力改變人們心理狀態的問題，紀登斯認為上述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因為這些改變主要不是依賴於物質環境，而是依賴於日常忠誠等可利用的因素，如果政府能將增進人們幸福視為目標，關心人們的心理狀態，而透過創造及維持社會互動網絡，倡導及支持各式的自主性團體，即能為心理發展提供條件，消除損害自尊的情境，以及發展更多的好處(Giddens, 1994: 187)。

(四) 避免福利依賴現象的出現

針對福利依賴的問題，紀登斯(1999: 66, 123-125)提出「工作福利」(welfare to work)以及「無責任即無權利」的主張，要求不能再像舊式社會民主主義那樣將權利視為不需附帶任何條件。福利政策一方面必須導向於增加工作能力與意願，另一方面則要求領取失業補助金者必須履行主動尋找工作的義務，這種作法除了企圖對於那些終日無所事事者有督促的力量之外，也鼓勵人們從工作中找到自尊、自我實現等幸福。當然紀登斯並沒有忘記工作並非人們生活的唯一目的，因此，他也同意對於那些自由工作者、藝術創作者，仍有另外斟酌的必要，而且對那些身心狀態不能工作者也應該提供基本生活所需。基本上，筆者歸納紀登斯對於福利政策的想法是責任是相對的，貧者有責任善用資源、盡可能獨立自主，富者則有納稅等基本的責任，並不應自外於社會。

在《第三條路及其批判》中，紀登斯(2000)也對左派及右派所提出的質疑有所回應，主要有針對社會中菁英取向者的要求：福利不能形成依賴，犯罪率必須降低，以及左派對平等的關切。紀登斯主張福利的給予不能形成依賴，犯罪不應赦免，亦即人們可以爭取權利，但犯罪不能夠歸諸於權利的缺乏。此外，平等不能導致供給面的減少，亦即不能因為要實施分配的平等，反而讓有智能之士放棄了冒險犯難的開創精神。

四、理想的設定：自主的自我

上述積極福利與創生性政治的目的都是培養自主的自我 (autotelic self)。自主的自我具有兩方面的特性，第一是源自自尊的內在信心，第二則是具有本體安全感，能夠積極地面對社會差異。自主的自我能夠將潛在的威脅轉化為具有回報的挑戰，並且能夠將混亂變為具有秩序的經驗，它不會試圖將風險去除，或希望

生活在沒有風險的環境之下，也不指望只由他人來解決問題，而是透過主動積極地面對風險以獲致自我實現（Giddens, 1994b: 192）。

紀登斯（1994b: 193）主張在後傳統社會中要能自我實現，個人透過對反思性地組織起來的訊息所進行的各種選擇必須要能夠創造獻身（commitment），獻身使得人們能夠面對壓力、處理紛亂的事件，持續地涉入一系列、延續的工作，並以發展自我為目標，但這絕不是自我主義。他引用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的見解，指出一個關心互動而非僅憂慮自我的人不再覺得自己是個獨立的個體，但他的自我卻會越來越強健。自主的自我超越了個體性的限制，而將心理能量投入自己所涉入的系統中，藉此自我也在更高的層次中出現。

第四節 高度現代性之下的自然風險

由於高度工業化與科技發展的進展，造成自然已經人為化、社會化，導致生態惡化、生殖意義轉變，以及嚴重後果風險的產生，必須有所因應，紀登斯乃提出了以下的觀察與對策（1994b: 198-228）。

一、自然生態的地位

在檢視過激進生態學、深生態學、綠色烏托邦等綠色理論的主張之後，紀登斯（1994b: 202）指出這些理論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永續發展、扶持地方多樣性、堅持事物的相互聯繫性等，都與哲學保守主義的主流相互呼應。但是他也認為生態觀點與保守主義的聯繫，並不比左派或自由主義來得多。綠色哲學的真正意涵反應的是政治取向的轉變，它們既不贊成所有事物都會向更好的方向轉變的進步主義，也另外開發了社會主義框架中所無法含括的激進主張。

紀登斯（1994b: 206）主張生態問題應該被理解為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處理反身現代性的問題，因此是與去傳統化相連結的。這是一個既新又舊的問題，因為我們所處環境中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機制迫使我們必須解決「我們將如何生活？」的問題，也再一次地使得我們必須面對曾經隱藏在傳統與自然背後的道德問題。現代文明的發展是透過人們對環境的控制來實現的，但是這種控制取向已經遇到了自身的限制，這些限制一方面來自人為不確定性越來越普遍，另一方面則來自於基本的道德問題和我們的生存困境。

但紀登斯（1994b: 208-212）並不完全贊成綠色政治理論的主張，而提出了他的批評與修正看法，他認為綠色主張不應也不能是一種遠離人們的戰略、保護生態與保護傳統沒有內在的關連、控制自然不等於損害自然、控制自然可以讓自然成為有益的力量，去中心化的主張應該配合採取有力的措施以確保環境免於遭到破壞，小社群不一定具有更多的多樣性，城市也常常是培育多樣性的場所、不必然是匿名或沒有個性的，因此環境保護不能一開始就區分自然與社會。今天我們談論的生態問題都是關於被社會化或被管理的自然，尊重自然不在於因為自然的範圍超過我們所能控制，而是同意某些自然過程最好應該被重新恢復，這種恢復就是一種經營管理，而且由於存在有許多威脅與風險會破壞這些自然過程，這些經營管理在實質上是保護性的。而我們關注這些被管理的自然不僅是關心自然本身，更是關心引導這些管理的價值，因為所有這些都牽涉到「我們將如何生活」這個問題。

二、繁殖的意義

在生育下一代的相關問題上，科學創新與人為不確定性帶來了各種機會與災難。紀登斯（1994b: 212-219）預期如果科技繼續進步，可能有一天我們將不只能夠設計環境，還可以設計我們的身體、心理組成，但他質疑這種情況的可接受性，這其中牽涉到科學的角色。科學權威在現代性中取代了傳統權威，卻宣稱自

己的立場是中立的，但紀登斯指出自然並非任人宰割的，風險不僅是外部的，科學的控制傾向無法完成自身的正當性，因此當科學內部的爭論反思性地進入非科學的論述與行動領域中時，人們的生活就捲入了無法完全控制的巨型實驗中。其結果是科學的角色發生變化，科學發現被依據不同來源的知識加以思索、批判與使用，許多科學宣稱甚至在尚未被證實之前就進入了公共論述之中，而每一個具體的環境下對科學的創新使用也都可能造成新的情況。在這種狀況下我們應該關心的將是如何能夠正面利用生命的道德特徵與確保人類潛能的實踐，因為在環境、自我或身體都不再是既定的狀況下，一個人如果不重新發現道德生活就不能變成「某個人」，沒有這種與個人生活的倫理學相接觸，冷漠的強制就會佔據上風，並且變得普遍。

三、嚴重後果的風險所產生的秩序

紀登斯（1994b: 219-224）認為意識到生命的神聖性也會意識到全球溝通的重要性，因為在人類相互依賴日益緊密的現代社會中，人類日益具有共同的利益。反過來說，快速發展的嚴重後果風險也正威脅著每一個人，成為人類集體最具有威脅性的缺陷。雖然這些風險往往遠離人們的日常生活，但卻絕對會影響人們的意識，最好的行動方針是採取預防措施，而不是爭論這些威脅是否真正存在，不論是針對核戰、全球的暖化或是愛滋病，應該強調的是如果不採取合理的行動，這些威脅就會迅速蔓延，並導致嚴重後果。有了這些預言與計畫就能導致行為的改變，即使後來的發展可能使得這些預言與計畫在表面上看來不是那麼必要。

紀登斯因此認為後果嚴重的風險顯示了一種現實主義烏托邦的存在，讓世界回歸到自己的自然秩序、人類從中撤離、尊重有機體系甚於尊重自己，以此限制自己的慾望，這些都是全球合作的烏托邦，承認人們在多樣性中存在有統一性，讓我們能夠共同努力去避免這些後果嚴重的風險。

第五節 暴力管制

管制和限制暴力是紀登斯所重視的另一項重點，他（1994b: 229-245）認為作為使用武力造成肉體上傷害的暴力必然存在，而且常常是與權力結構聯繫在一起的，藉助它，個人、團體及國家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在他人身上。而激進政治學的內容之一就是提出和平化（pacification）的主張，將暴力手段的控制權交給具有正當性的權威，並且將所有的暴力盡可能最小化。在國家層次上，現代社會隨著資本主義與議會民主的共同發展，加上集中性法律體系的建立，已經將暴力從政府的直接機制中排除出去。而且戰爭的工業化與核戰的巨大威脅，也使得戰爭不再是外交的延續，相對地，外交必須竭盡一切可能來避免戰爭。公民責任也從強調好戰的軍國主義轉移到強調培養和平的價值，男子漢氣概變成與獻身於工作以及為弱勢者提供服務等相聯繫起來。

至於在性別暴力方面，紀登斯（1994b: 235-242）認為傳統上男人對女人的戰爭是例外而非常態。父權制度並不主要靠使用暴力來維持，而是將男性對女性的權力加以正當化，其基礎則在於性別角色的分工、相關價值與公私領域的區別。其中很重要的一項是分化的婦女觀，亦即將婦女分為守婦德的與腐化墮落的，用道德贊同與尊重來對待守婦德的女性，雖然對女性錯誤行為，採取敵意與肉體上的迫害是很重要的懲罰機制，但暴力手段其實更主要是用在男性對男性的鬥爭中，並且是與維持家族榮譽等秩序相連在一起的。今天這種暴力體制已經逐漸崩落，而且隨著婦女加入勞動、普遍的民主化和家庭型態的不斷變革，都成功地挑戰了父權制度，反而造成許多男性因為無法適應父權制度的消解，而對女性施加直接的暴力，但這種挑戰仍成功地將過去被掩藏的東西公開出來，並且對傳統進行質問。至於要能真正克服男性對女性的暴力，必須要有工作、家庭與國家方面結構性的變化，透過由此產生的可能性，並結合對話民主的擴大，來達成兩性之間情感的重新結盟。因為在現代性的早期，男性認同一直與全日制工作聯繫

在一起，男性參與了公共領域的活動使得男性的生活體驗與女性有著本質上的差異，許多男性的生活與情感聯繫被切斷，造成目前普遍認為「男性情感無法表達」的現象，而女性則被男性留在情感領域中，扮演「愛的專家」的角色。隨著女性在公領域的發展、新的性別角色的提倡，透過情感的民主、持續的對話，男性對女性的戰爭會有所減緩。

在不同族群間的暴力方面，在全球化之下，隔離已經不再可能，人們只有兩種選擇，不是加強溝通，就是強制與暴力。與族性相關的不平等經常是緊張和相互敵視的根源，要阻止這種暴力發生的可能性應該加強三種相關的環境，第一是發揮對話民主的潛在力量，第二是反對基本教義，第三是避免情感溝通的退化。雖然各個團體與民族差別必然繼續存在，但如果這些民族與文化差異普遍存在，且透過大眾媒體的穿透性影響，讓大眾習以為常，則不同的文化就比較能夠在世界主義氛圍之下和諧地發揮正面的相互影響（Giddens, 1994b: 242-245）。

第六節 教育上的衍釋

對於現代性制度的四個面向所可能產生的風險，如集權主義、經濟崩潰與貧富懸殊、自然的毀滅與暴力等問題，紀登斯提出深化民主、福利制度的變革、思考去自然化對人類生活的意義，以及管制暴力等治理原則，在教育上也有其可以衍釋的部分：

一、教育宜盡量發揮對話的效果，以增進彼此的認識、相互容忍、建立共識及刺激彼此思想發展，並進一步化為行動。

由於行動者的意識會受到行動者所在社會位置所能獲得的知識管道、知識的組織及表達形式、信念主張被視為知識的過程、可用以散播知識的方式等相關因素的影響，不同生長背景、族群與性別的個體都會有不同的認知狀

態與理解事物的方式，需要積極地進行對話。但對話的目的並不在於強求達到一致的共識，更重要的是增進彼此的認識以及相互容忍，產生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紀登斯所主張之對話民主所具有的幾項特性：自我了解、自我開放、真誠地與他人交流、創造更大的論述空間，與弗雷勒（P. Freire, 1921-1997）所主張對話中的愛、謙卑、信心、真誠意願、希望與批判（方永泉譯，2003: 127-134），有相互彰顯與互補的作用。一方面對話的雙方必須懷抱真誠與平等的態度，另一方面彼此也宜秉持「作為學生的教師」與「作為教師的學生」的思考，相信彼此能夠為對方帶來貢獻。另外，透過對話辯證加強學生的論述透視力，除了可以讓彼此更清楚自己的定位之外，也可以避免優勢階級將其意識型態及利益偽裝成真理或普遍利益，使得政治或教育措施更具公開透明性與責任。

當然不同年齡、不同的知識領域，學生所能擁有的知識與對話能力會有所不同，教師宜審慎斟酌學生的處境、能力與需求，來思考對話的內容，這一點與傳統教學理論中重視學生的先備知識是相容的。因此，對話式的教學並不如想像中的困難，不論是社會領域、人文領域、自然領域或其他領域，都可以找到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的主題來進行與學生的對話，而為了鼓勵學生發展對話的習慣，教師不僅可以積極回應學生的正式發言，即使只是學生發出的與討論內容相關的隻字片語，教師也都可以積極採用，作為課程發展的線索，並透過學生的表達，了解不同情境下的不同立場、找出教師教學上的盲點，達到教學相長的效果，並透過增權賦能，化為行動來改造社會。

二、國家的福利政策宜重視提升國民的能力，及增進全民福祉的總量，其中教育作為提升國民能力的主要方法，除了宜盡可能促進優勢者與弱勢者的雙贏之

外，必要時，也應該有對抗利益團體的勇氣。但教育當局也不能爲了平等，而壓抑優秀學生的機會，而是應盡力追求「因材施教」，同時或依不同階段重視卓越與扶助弱勢，使國民能各得其份。

現代國家有一定程度的福利措施應該是大多數人都可以同意的，但其實施不宜只是物質上的重分配，而應該是能力上的增權賦能，並應盡可能同時促進優勢者與弱勢者的福利，增進全體人民的福祉總量，其中教育是達成此目標的一項主要方法。當然利益的衝突難免，但即使從自利的角度來看，國家機器的掌控者與資本家的利益未必相同，教育主管與政治領導人的利益亦未必一致，不論是基於全民福祉或想要成就自己，掌權者都不宜因循既有勢力的主張隨波逐流，而應堅持理想有所作爲，並有對抗不當壓力的勇氣。

紀登斯要求新工黨要有對抗工會的勇氣，在我國政府也應該有對抗利益團體的勇氣，例如在推動弱勢學生課後照顧、鼓勵社區婦女二度就業的政策上，即應該有勇氣對抗補教業者的壓力，持續推動，並將其推廣到國中階段，而不應將其視爲應由家長負完全責任之事。在公共設施上，也應該廣爲建設各式富有教育意義的空間，而非如現在的一些作法，任令空間不斷地私有化，或想盡一切辦法破壞個人隱私，驅逐弱勢族群(畢恆達，2001：104-112)。

然而無可否認地，中上階層、優勢族群在教育上可能獲得較多的利益，而且這種現象基本上很難完全消除，一方面他們掌握了更多的知識與資源，另一方面他們投注了更多的心血。但如果只是爲了齊頭式的平等，而要求全體一致、只能有一套標準，或欲以一組霸權取代另一組霸權，卻是不切實際，也是沒有效率與助益的。例如，最有經濟能力的家長可能會想辦法將子女送到國外，經濟能力稍次者可能將學生送至貴族學校、明星學校，再次一級者，則是爲子女安排各種才藝、補習與透過管道進入特殊班，接受教學能力較佳的教師的教導。這些現象雖非理想教育的樣貌，但除了消極的限制之外，教

育工作者更應該做的是努力提升各學校的教育品質，才有可能達到雙贏的目標。另外，無法適應正規學校制度者也應該可以有選擇實驗學校、中途學校、在家自學、另類教育等的機會與權利。

再就升學制度而言，不能因為要求平等就只採計一種標準，這樣反而會導致資質較優異的學生在書本及考試上浪費過多的時間，如果能夠有合適的配套措施，引導這些學生進行高深知識的探索，或在其他活動及才藝上有所發揮，則有積極正面鼓勵追求卓越的作用，因此，目前的甄試與申請入學制度值得保留，而非回到過去的聯考制度。至於那些家境較弱勢的學生，至少在國民教育階段，政府應投注更多的人力與資源在學校的補救教學和社會教育機構上，鼓勵各教育機構發揮創意，提供學生更多不同的學習機會，例如更多的個別指導、線上學習、電腦網路搜尋服務，免費的創意開發課程等等，以增進弱勢學生的學習能力，並提供其探索發展可能性的管道。

唯有讓所有的人盡可能地發揮其潛能，把餅做大，才能讓更多的人有更滿意的生活，也才能避免經濟上層人士自外於社會整體，或下層人士被排除在社會之外。也就是說，扭轉或補足社會正義的途徑並非回到齊頭式平等的作法，而應該是要盡可能以創生性、具生產力的方法來加以解決。當然，特別弱勢者無能力自我照顧者，國家也應該負起照顧的責任，在特教與社會福利上給予協助，而非任其自生自滅。

三、現代社會屬於後匱乏秩序，能動者宜負起自己應有的責任，建構自己的生活風格，積極尋求各種可用的教育資源，獲得創生性與解放性的權力，達到自主自律，並對他人有所貢獻。

現代社會個體具有更多的選擇機會，也必須做出各種選擇，包含工作、學習、興趣、休閒活動、衣食住行育樂等方面，都有待能動者加以決定。但

現代社會在物質上的發展，已經使得大部分的人們可以免除基本生活物質上的匱乏，生活風格作為建構自我認同的物質性基礎，就成為每一個人必須自己做出決定的事務，在教育上也是如此。

雖然每個人的出身與遺傳會有差異，選擇的範圍有所不同，但在基本生活無虞之後，居於相對弱勢的族群應該負起責任，善用自己所能獲得的資源，追求自己的幸福，而非自怨自艾地埋怨社會不公，甚至製造問題，成為社會的負擔。例如，每個家庭的父母都有必要反思自己每日孜孜矻矻地工作賺取金錢，欲求改善家中的物質生活條件，卻將子女放在家中不予教誨，是否值得？或者是寧願在物質上妥善規劃、清苦一些，而將更多的時間用在親子互動上來得值得？此外，與其消極地避免接觸主流社會，懷疑教育的功能，不如能夠善用各項公共資源，如圖書館、社教機構的活動等等，或尋求企業的回饋，甚至發動自助團體、社會運動，形成一股自主、自助的力量，改善自己或子女的生活及教育處境，這既是一種創生性的權力。同樣地，教師也可需要找到更好的資源，協助學生成功，而不是為失敗找藉口。

至於自主與自律的重要性，在於自主能夠使行動主體不需依賴他人，不至於人云亦云、喪失獨立判斷的能力，自律則使主體不至於目中無人、狂妄自大。除了把握自主自律的精神之外，事實上能動者也應積極地以他人為師、為鏡，從與他人互動中得到自我發展的豐富資源，並勇敢地開拓自己的可能性。同時，能動者也應努力對他人有所貢獻，這不只是對他人有利，也將會對自己有利，因為越關心他人、越不自私的人，其自我越能往更高層次發展，也越能成就自己。

四、由於現代性社會中改變的可能性極大，有利於具有良好反思能力者的生存，因此學生有必要具備終身學習的態度與能力。在培養學生的基本能力時，教育當局可善用退休人才追求生命意義的動機，協助弱勢學生獲得基本的學習

能力。

由於現代社會的極端動態性已經使得各種職業的變化加劇，各級學校的教育也無法與職業需求充分配合，人們必須隨時為未來的轉業做好心態與能力上的準備。當然能做出正確的選擇者，通常都是那些具備文化識能與足夠知識的能動者，因此，如何培養學生具備基本的學習能力乃成為相當重要的工作，但這一方面卻是學校教育工作者常常有心無力的部分。

相對地，在壽命增長、為謀生而工作的需要減低之後，人們更有機會脫離先前既定的處境，開發更自由的人生，這一方面，能動者也需要積極加以準備，才不至於在退休後即失去人生的目標與方向。如果政府能夠積極地為這些可能為數眾多的可用人才營造各種創生性的環境，鼓勵各項創生性活動，讓這些人才協助弱勢學生重新習得基本的學習能力，則一方面可以幫助弱勢學生適應未來生活，另一方面，不僅讓退休人士更多了自我完成、自我實現的機會，也能消除其「退休即是無用」的心理，並能將其力量導向成為社會發展的助力，一舉兩得，值得持續擴充性的發展下去。

五、教育應從正反兩面看待資本主義與商品化，除防患其負面影響之外，並應積極加以消融。

現代社會在資本主義結合工業化大量生產，貧富差距往往越來越大，也往往會使得人們產生現世、媚俗、拜金、墮落、享樂、麻痺等取向。許多人對金錢的花費或物質的取得往往是為了炫耀而非需要，經濟弱勢者則一直處於不利的地位。

對此，教育應該教導學生正確的價值觀，首先，金錢不是萬能，有更多的事物非金錢所能購得，如親情、友誼、道德、知識、存在的意義等才是人

之所以為人的真正價值所在。其次，作為個人自我認同的物質基礎之生活風格與品味，既不是非得靠金錢才能堆砌，金錢也未必能夠堆砌品味與風格。第三，除了將金錢花費在自己身上可以獲得滿足之外，透過資助他人也能產生不同的快樂。第四，富者誠實納稅所減損的金錢並不會減少其自我實現的機會，反而有助於社會的整體提升。第五，貧富差距過大既不符合社會正義，也會對每個人都產生不利的後果，而且資本主義並不只有「新美國模式」，還有「萊因模式」，更值得提倡。這些都是教育工作者為減少資本主義的負面效應所值得教育下一代的價值觀。

當然，商品化或市場化不一定是標準化、一致化，也不一定會抹去產品的文化價值與商業價值的區分，它還有讓人們的生活擺脫政府或教會控制，導致分化、多元化與自主等正面的作用（陶東風，1999: 173-176），應給予肯定，不需要視之為毒蛇猛獸，更不應使其屈從於政治機器之下。但除了政府與市場之外，公民社會也應積極加以建立，使構成三足鼎立的權力平衡。

六、對於自然與科技的風險，教育應重視預防性措施。

工業大量生產之後，往往造成生態的危機，而生態危機將影響到每一個人，這些問題在輕微時往往不受重視，但等到嚴重時，卻可能難以挽救。因此，認為發現自然法則之後，即可以無限制地「戡天役物」的想法必須有所保留，因為可能還有更大範圍的因果關係未被我們發現。而對於生態危機，則必須防患於未然，只要有發生危險的可能，就應該有預防及因應的措施，而非爭辯危險是否存在。例如將環境議題融入教育中，並提倡綠色生活即有其必要，但提倡綠色生活的目的並不在於棄絕文明、苦行自虐，而是認知到繼續浪費下去生活將無法舒適，所以需要學著過舒適而不浪費的生活，才能更調和自己與自然的生命，讓我們能夠更自在地生活下去，而不再過著「役

於物」的生活。

至於科技與生殖問題，除了工具性的思考之外，也要有關於人之爲人的倫理與道德思考。如果科技的發展造成人的獨特性消失或生命的尊嚴喪失，則這種科技就沒有益處。這一點，不僅是政治人物面對不同專家的不同意見時應該秉持的態度，也是我們教育下一代必須走的方向。

七、對於暴力，除了要防止大規模的暴力（戰爭）之外，也要防止小規模的暴力。教育應透過轉化英雄氣概、培養欣賞差異的習慣等方法，盡一切可能去除教育系統與其他系統中的暴力，以及面對暴力時的智慧。

暴力對人的生存構成極大的威脅，也讓人受到強制、失去希望與自尊。因此，除了國家要將必要的暴力使用權（警察、國防）納入合理的規範之外，教育應該盡一切可能去除暴力，唯有免除暴力的校園，我們才能希望有免除暴力的社會。其作法可以從培養兩性平權、互助互信、對話民主的觀念開始，鼓勵社會成員與學生能夠包容、欣賞、歡迎差異、反對基本教義主義，避免黨同伐異所可能造成的暴力，再透過談判學習與他者相處，同時也應該將英雄氣概導向於助人與對工作的投入，以和平代替尚武精神，讓強者充分發揮其長處。此外，還要培養面對不正當的暴力時的智慧，才不至於在遇到暴力時驚慌失措，讓使用暴力者得到增強。

